

周谷城《世界通史》古代部分 販賣了哪些反动观点？

李世洞

周谷城的反动史学观点，已有不少同志进行了批判。本文仅对他在《世界通史》第一、二册古代部分中暴露出的反动观点进行一些揭露。

一、宣揚各种唯心主义的“决定論”， 反对馬列主义的階級斗争學說

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什么，这一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同反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马列主义看来，“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决定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①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②这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由此决定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来寻找一切历史事件、历史变革和旧社会代谢的根本原因。

周谷城先生是怎样解释古代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的呢？读一下他的“大著”，就不难看出，原来他是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贩来了一大堆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塞在自己的书中加以兜售。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些货色吧。

首先是自然条件决定论。周谷城在书中常常借汉丁敦、塞克斯等反动资产阶级学者之口，大量宣扬自然条件决定论的反动观点。例如在第二册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的“自然环境与人民”一目中就写道：

“气候对于土地的构成，人民的生计，政治的形式，历史的发展等等……有极大的影响。”^③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0页。

③ 周谷城：《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51年8月第三版，第二册，第240页；以下凡见于本书的引文，均只指明册数和页码，不另加註。

“气候日趋于干燥，实在是人类的不幸；饥荒大患便从此发生。这些饥荒大患，又是战争及人类之大迁徙的实在原因。战争与迁徙，曾使许多朝代，许多帝国趋于灭亡；也曾使许多新民族，许多新文化，趋于成长。”

“假如一个地方的气候渐渐变成润泽的，则居民的生活情形当随之改善，生活必渐趋于舒适与繁荣。在这等地方，战争发生的机会比较少，人类的心思才力，可多用于创造文化的学术方面。……气候变化与历史盛衰相应的道理……实可应用于旧大陆，乃至新大陆一切有历史文化的地方。”

（第二册，第241—242页）

这些话的意思很明显：气候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动力，不仅波斯一地如此，全世界有历史文化的地方都概莫能外。这正如毛主席所曾指出的，是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是一种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①，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自然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的优劣变化当然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在古代，当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尚很低弱的时候，它的作用还更显著一些，但是它决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因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而外因不过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社会历史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只有到社会的内部矛盾中去探求，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阶级社会中被剥削人民的痛苦生活亦即“饥荒大患”，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气候日趋于干燥”，而是社会内部存在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压榨与奴役。阶级社会中的战争同样由这些原因所引起，没有剥削制度的存在，就不会有剥削阶级发动的各种反动战争，也不会有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战争。至于朝代的更替，帝国的兴衰，同样不能从自然条件中去寻找答案，因为“地理环境方面一种稍许严重的变更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社会制度中甚至最严重的变更，也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就够。”^②几百万年才发生比较显著变化的自然环境，当然不可能成为朝代更替帝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毛主席指出过：“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③由此可见，周谷城所吹捧的自然条件决定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谬论。这种谬论的反动作用就在于：它一方面抹煞了阶级社会中人民生活贫困的真正根源，说什么“气候变坏，则生活贫苦，人口彫残”（第二册，第241页），从而转移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仇视，散布宿命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把剥削阶级所进行的一切反动战争也归之于气候的变化，掩盖这些血腥罪行的根本原因。二者结合，恰恰是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打掩护。

周谷城不仅以自然条件来解释历史发展，而且还把它作为区分人类社会的标准，说“世界古文化（他这里的所谓古文化是泛指古代文明，亦即古代社会，下同——引者），是依自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然环境而分布的。……凡可分布为三带：即寒带、中带、热带是也。”（第一册，第197页）中带的世界古文化，又可分为以吃麦子为基础的欧美文化，以吃大米为基础的中国印度文化，以吃玉米为基础的中美文化（第一册，第200页）。按照类似的原则，他又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而中国文化据说是东方文化“最纯最好”的代表，理由是中国“至今不注重饮用牛乳。”（第一册，第201页）你看，吃大米而不吃麦子、不喝牛奶就成了东方文化的“基础”，吃麦子、喝牛奶而不吃大米，就成了西方文化的“基础”，这岂非自然条件决定论的铁证吗？可惜的是，周先生在贩运这些资产阶级货色的时候，忘记了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常识。中国的长江以北，有大片的地区产麦，也以麦子为主要食品，难道那里的文化就不是中国文化？古代希腊人“也不注重饮用牛乳”，难道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最好最纯”的东方文化？臆想不是科学，周先生这种“理论”真是不值一驳的。尤其荒谬的是，周谷城在划分他的“文化带”时，竟把西藏从中国割裂开来，以之与中国并列，说什么“中带包括……中国、西藏……”云云（第一册，第199页）。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一贯把西藏和中国并列，其目的就是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为阻挠中国人民行使对西藏的主权和他们侵略西藏制造理论根据。周谷城在所谓学术著作中跟他们一鼻孔出气，替他们帮腔，说明他连有无反帝爱国的思想都是成问题的。令人不可容忍的是，这部《世界通史》三版时还在这个问题上只字不改。1951年8月正是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后的三个月。在这以前，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者大嚷大叫，反对解放西藏，说什么“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中国人民对这种谬论给予了坚决的驳斥，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终于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周谷城在此以后，竟还把西藏地方和中国对举。我们要问周先生，你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

周谷城从自然条件决定论出发，很自然地导出了他的“生存竞争”论。既然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有如此决定意义，为了争取优越的生活环境，各民族必然展开“生存竞争”。于是，周谷城就振振有词，按照这个公式解释历史。在早期希腊，“各部族为争生存优越条件，战争时起，是曰部族战争”（第一册，第112页）；罗马帝国晚期，“直接驱使蛮族南侵的，为匈奴人之压迫。”而匈奴人之所以要“压迫”蛮族，是为了“寻找游牧新地”（第二册，第448页），亦即新的、更好的“生活环境”；氐羌之所以要东侵今四川之地，是因为他们居住地“天然的生活条件，不及汉族所棲息之地方远甚”（第二册，第501页）；匈奴、鲜卑人之南侵今山西陕西之地，是因为“其生活区域……天然环境远不及汉族处境之优”（第二册，第501页）；波斯帝国之所以要四出扩张侵略，是因为“要征服四邻，开辟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巩固生存的环境”（第二册，第275页）；以及如是等等。在周谷城的笔下，奴隶主国家的扩张侵略，古代各民族间的战争都变成了“生存竞争”。

这显然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搬到了人类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社会斗争无不是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对外扩张，不过是对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广大人民进行的一种阶级压迫，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什么“巩固生存的环境”，而是为了掠夺更多的奴隶、财富和土地。至于古代社会各民族间的战争，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阶级社会中，民族战争是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民族矛盾实质上就是阶级矛盾。古代波斯与非波斯各族间的矛盾斗争，罗马与非罗马各族间的矛盾斗

爭都毫无例外。毛主席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①这在世界古代史上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只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古代社会的各种斗争，尤其是以激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战争，才能正确地认识其本质，也才能正确地评价它们。周谷城为了替剥削阶级的侵略、扩张、镇压等暴行辩护，为了愚弄被剥削、被压迫、被侵略者，当然不会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明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根据他的“生存竞争”的理论，民族间的“弱肉强食”乃是自然的公理，因此他说：“生存竞争一起，强的自然吞併弱的，大的自然吞併小的。其手段不外征战，其结果便是联合”。而这种“联合的事实，完全出于自然”（第二册，第475页）。他在这里一口气用了好几个“自然”，使人感到仿佛谁也违拗不了。这就等于说，你弱我强，你就得受我侵略奴役，如果嫌这种说法刺耳，那就是，你得和我“联合”！周谷城的这种腔调和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周谷城还打起人口决定论的锣鼓。他说，在希腊城邦“多数平民因人口增加，土地有限，逐渐贫困，遂成平民；或为僱傭，或为奴隶。”（第一册，第114页）又说，罗马“氏族人口有多寡的不同；一旦私有土地制成立，则人口较少的氏族中，必然产生大的土地所有权，因而产生大地主阶级”（第二册，第409页）。这样，人口一多，就导致平民贫困破产；人口一少，就导致“大地主阶级”出现。人口多寡成了左右历史的槓桿。

周先生这些说法，如果不是对希腊罗马历史的无知，就是对它存心歪曲。我们知道，不管是在古代希腊或者罗马，小农的破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都是奴隶制排斥小农经济、大奴隶主阶级对小农实行兼并的结果。罗马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当时罗马奴隶主阶级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一般农民却在频繁的战争中或受战争之直接破坏，或被迫长期出征而抛荒田地，濒临破产。大奴隶主阶级利用这种情况，依靠自己优越的经济势力，对小农进行排挤与吞併。这在古代史家如李维、阿庇安的著作中早已有明确记载。即使象布罗克这样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在谈到罗马大奴隶主阶级兼并小农时说：“协议购买不成功时，则用阴谋诡计——法律上的征用和毫不客气的暴力抢夺，势必弄到手才甘心……家长因去服兵役而不在家，土地便更加容易被夺。”^②然而，周谷城却公然无视历史事实，硬把这些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归之于人口的多、寡、增、减。周谷城这样解释历史的结果，一方面掩盖了罗马大奴隶主阶级的兼并掠夺暴行，把他们的起家说成是由于得天独厚的“人口较少”，另一方面也就抹杀了大奴隶主阶级与农民间的对立斗争的关系，散布阶级调和论，公然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唱对台戏。

周谷城的这种谬论，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翻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归之于劳动者的人口过多，“新马尔萨斯主义”则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贫困的根源归之于殖民地的人口过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牌号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也大喊大叫说：“举凡内乱之频仍，饥饉之屡告以及生活程度之所以低，乞丐盗贼之所以多，推其原因，莫不由于我国人口之过多。”^③1949年，当中国人民在中

① 毛澤东：《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② 轉引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商务印書館1963年版，第222頁。

③ 轉引王亞南：《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論与中国人口問題》，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頁。

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时，帝国主义者艾奇逊也向中国人民唱起了“人口论”，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革命的发生皆在于“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①这种种“人口论”的调子，不管是十八世纪的，还是二十世纪的，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其中心目的就在于歪曲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贫困生活的真正根源，为剥削阶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侵略、奴役等暴行辩护。周谷城与他们所不同的只是把这种反动滥调搬到了世界古代史的领域而已。

周谷城搬运的这种所谓“理论”，早已被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批驳得体无完肤。毛主席在驳斥艾奇逊的谬论时，就曾指出：旧中国人民之贫困，革命之发生，都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②他还指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份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③可是周谷城并没有从这里吸取任何教益，改造自己的唯心史观，在《世界通史》1951年再版时，还只字不改地兜售这种“人口决定论”。这就说明周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多么地顽固。

除了自然条件和人口决定论，周先生还有一手意识活动决定论。他在介绍资产阶级文化传播派的观点时说：“……古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播，据说完全由于人类之追求‘永生’，或追求‘赐与生命的物质’。……人类的这种追求，或欲望或意志，就是古文化产生或发展或传播的动因。”（第一册，第214页）周谷城自己则认为“这种讲法，于理亦未必全不可通。”（第一册，第236页）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古代文化产生发展的动因，只能从人们的大脑活动如“追求”、“欲望”、“意志”等等中去寻找。事实上周谷城也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他认为古代埃及人“追求”来世生活而产生了宗教信仰，而对“神灵的信仰与灵魂的信仰，几乎是埃及发展文化的两大动因。”（第一册，第64页）于是“建筑、雕刻、图画、文学为狭义的高级文化，都直接随宗教信仰而产生；至于广义的普通文化，直接或间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产生者，更不知凡几。”（第一册，第65页）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就说防止尸体腐朽之诸种努力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动因，亦无不可。”（第一册，第65页）周先生一向以一个唯物主义历史学家自居，可是他这些叫人吃惊的奇谈怪论，除了说明他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拾取一些牙慧而外，那里还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影子？不错，古代埃及的文化受宗教影响比较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不管这种影响多么显著，它也决不是埃及文化产生的动因。任何文化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如果没有古代埃及劳动人民创造出一定的生产力，积累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金字塔、大雕像根本不可能出现。何为本，何为末，是显而易见的。周谷城戴着唯心主义的眼镜，当然会把本末倒置，看不到历史的本来面貌。

周谷城还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其他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他说波斯摆脱米底之统治是因为居鲁士要“报仇”（第二册，第256页）；马其顿亚力山大东侵是由于波斯使臣侮辱了马其顿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页。

女人，因而激起了他对波斯的“仇恨”（第二册，290页）；至于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他居然说“爱好希腊文化，据说也是一个动因。”（第二册，第419页）这样，一恨一爱，就都足以兴动千军万马，掀起杀人掠地的战争，形成庞大的帝国。把人的意识活动夸大到这种地步，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竟以为那里起作用的观念性的冲动力是事变的最终原因，却不去研究这些冲动力后面所隐藏的是什麼，这些冲动力的冲动力又是什麼。”^①这当然不可能找出历史变革的真正原因。

马列主义并不否认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对历史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人们各种各样活动的结果，“而人是赋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行动或在热情影响下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目的的。”^②这样，各个历史事件中必然带有由于不同的人的活动而产生的许多特点，它们之间也就有着许多差别。“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各个时代和各个事件的研究——如何重要，它却丝毫也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服从于内在一般法则这一事实。”^③恩格斯对此曾更加明确地指出过：“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④。

按周谷城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只有闖进死胡同。如果说波斯使臣对马其顿女人的侮辱引起了“仇恨”，“仇恨”推动了马其顿、希腊奴隶主阶级的东侵，那么印度人，中亚的一些民族并没有触动马其顿女人的一根毫发，为什么马其顿、希腊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亚力山大这个大侵略者在灭掉了波斯以后还不收兵，还要打到印度河流域呢？显然，用“报仇”是解释不通的。亚力山大东侵最根本的原因，只能从当时马其顿、希腊的社会经济中寻找。这就是公元前四世纪以来，马其顿本国奴隶制经济发展，奴隶主阶级为了掠夺更多的奴隶与财富，需要向外发动侵略；而当时的希腊，又正处在城邦危机，经济混乱，社会动盪不安的局面之下，希腊的大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转嫁危机，也积极支持马其顿亚力山大东侵。伊索格拉底不是曾大声疾呼：“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财富带回希腊”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一次对东方人民的空前的大侵略，大掠夺。可是周谷城不去研究这些本质原因，却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不厌其详地描述波斯大使如何在酒宴上侮辱马其顿的女人。我们要问，周先生这样作的目的是什麼呢？是不是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马其顿奴隶主阶级描述成为受侮辱和受到挑战的一方，从而为他们的东侵辩护，并从而把亚力山大打扮成为一个“复仇”的英雄呢？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对亚力山大的活动没有表示丝毫谴责，有的是肉麻的歌颂。他的是非标准完全符合马其顿、希腊奴隶主阶级的要求。

从以上我们谈到的几个主要方面可以看出，周谷城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上，与马列主义的科学观点是根本对立的。他用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谬论反对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当前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斗争中，他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出力效命，为之争夺阵地，起了其极反动的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3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389页。

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61页。

二、歌頌奴隸主的統治，污蔑奴隸革命

周谷城还在《世界通史》为各古代国家奴隶主阶级大唱赞歌。在周谷城打扮下，侵略者变成了英雄，刽子手变成了天才。例如：吐特摩斯“有极伟大之武功”（第一册，第70页）；“大流士在波斯史上，是一个最有雄才大略的人”（第二册，第260页）；汉谟拉比是塞姆族历史上的“另一伟人”（第一册，第81页），因为他“创出一种新的秩序，在这新秩序中，人民的生活乃大进步。”（第一册，第82页）亚力山大更是了不起的“超人”“少年的时候，就与众不同：有能力，有天才。……求知欲望，终身不衰。……才二十岁的时候，便率大军进攻特比士，镇压其反叛，屠杀六千人，俘虏三万人；”于是“声威大振”（第二册，第292—293页）。终于成为一个“异乎常人的英雄”，“世界上空前出名的人。”（第二册，第300—301页）可惜就是死得太早了，“正当他享受盛名之时”“不幸为热病所袭，与世长辞；时年才三十二岁！”（第二册，第300页）在这类评论中，周谷城不惜选用最好的字眼，来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者歌功颂德。

在马列主义看来，不管是吐特摩斯、汉谟拉比，抑或大流士、亚力山大都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①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成员和代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奴隶主阶级是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总是要剥削镇压人民，侵略扩张，制造一切暴行的。不看到这个主要的和本质的方面，就不能正确地评价他们。对这些人物采取歌頌赞扬还是揭露批判的态度，是考察历史学家阶级立场的分水岭。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②同理，对于革命的历史家，暴露的应该是历史上的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可是周谷城对历史上的这类人物却是歌頌备至，为他们涂脂抹粉。周谷城叙述亚力山大死时那种不胜太息之至的感情，充分说明他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说话。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把剥削阶级的一切历史人物都简单地否定掉。对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人，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象周谷城这种毫无批判地把历史上的剥削者、压迫者，征服者尽情美化，和马列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周谷城对于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同样赞不绝口。他把奴隶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描写成为人民谋福利的机关，把官吏描绘成人民的勤务员。他说，汉谟拉比建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命令税收人员，奉行法令，毋得舞弊营私”要“昭雪人民的冤屈”（第一册，第81页）；《汉谟拉比法典》：“对于寡妇、残废、及贫苦等人应得的公道保障，有所规定。”因此是“历史上空前的伟大法典。”（第一册，第82页）他又说，罗马帝国统治各行省的制度“当很开明”，“多少还带几分民主精神”，派出去的官员能够“廉洁自持”，“对各地人民，并无横征暴敛的情事。”（第二册，第423页）如果历史真象周谷城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693年第2版，第XII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3页。

描述的那样，古代奴隶制国家豈非美妙得很？那有一点剝削压迫的味道？只要有一点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在奴隶社会，国家为奴隶主阶级所掌握，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统治阶级为了保卫其阶级利益，“除了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组织为国家外，还须把由特定关系所决定的自己的意志，以一般的形式表示为国家的意志，表示为法律。”^①可见法律也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同样是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工具。在奴隶社会，法律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占有和剝削的权利，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奴隶社会中的“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②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尽管282条本文有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但上述的基本特征是表现得很明显的。《法典》第19条：“倘藏匿此奴隶于其家而后来奴隶被破获，则此自由民应处死。”；第6条：“自由民窃取神或宫庭之财产者应处死；而收受其贓物者亦处死刑”；第21条：“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第205条：“倘自由民之奴隶打自由民之子之颊，则应割其一耳。”^③这只是随便选录的几条，类似的规定在法典中比比皆是。但是周谷城对这些条文视而不见，反而抓住毫无实际意义的“寡妇残废……应得公道的保障”云云大肆宣扬。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周谷城为了达到替奴隶主阶级辩护的目的，竟如此大胆地阉割歪曲古代世界的历史。

周先生用“开明”、“民主”等字眼来描述罗马对各行省的统治，同样是对历史的恣意歪曲。事实上，罗马每征服一地，首先是大肆抢劫。波里比阿曾谈及此事说：“为了进行劫掠，派出的军队从不超过一半，其余的战士仍留在战斗序列里以掩护劫掠者。所有派出劫掠的兵士，把卤获物都送到自己的军团里。”^④在劫掠以后，罗马就将当地一切矿藏、土地、盐田、造船塢、港口等宣布为罗马奴隶主阶级所有，建立起苛烦的赋税制度。埃及併入罗马帝国后，实物税达50种，货币税达450种；各省的官吏更其贪黷无厌，行省总督是罗马官阶争逐的肥缺。西塞禄弹劾西西里省总督瓦莱斯贪污的惊人案件，读罗马史的人无不知晓。象这样残酷的掠夺和剝削，请问，“开明”何在？“民主”何在？官吏的“廉洁自持”又何在？即使在某个时期罗马统治阶级对行省人民的压榨曾经有所缓和，但这丝毫也不是为了行省人民的利益，而是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象，“羊应该留着剪毛，不应当杀掉”。

周谷城用一付完全不同的脸色来对待古代世界的奴隶阶级和被征服被压迫的人民。对于奴隶和其他被剝削阶级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他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进行恶毒的誹謗。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埃及贫民奴隶大起义，公元前二世纪后半的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以及公元前一世纪的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都是古代世界史上被压迫阶级掀起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它们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并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周先生对这些斗争在书中只字不提，唯一提到奴隶斗争的是在“罗马帝国之就衰”一目中（第二册，第442页）。在这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322—323页；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8页。中译本这段话译得不够通顺明白，故未采用。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6页。

③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4、62、83页。

④ 转引狄雅可夫、科瓦略夫：《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高教出版社1959年版，第95页。

目中说：奴隶“常成群结队，逃到较为偏僻的地方，过不法的生活；甚至打家劫舍，为害乡里；终至乡里居住不安，来往旅行亦不方便。”（第二册，第443页）又说：奴隶还“杀戮主人，劫掠城市，”终于“成了社会的一种威胁”（第二册，第443页）。在周谷城的笔下，奴隶为摆脱奴隶主剥削的逃亡斗争竟是“过不法的生活”；奴隶的革命行动竟成了“打家劫舍，危害乡里”；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严重打击竟成了对“社会的一种威胁”。总之，奴隶成了一群十恶不赦的暴徒。毛主席说过，“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①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历史的写作者，那就是除非具有反动观点的历史家，才会把奴隶社会中进行正义斗争的奴隶，描写成为暴徒。正因为奴隶所杀的人是奴隶主，“打”的“家”“劫”的“舍”是奴隶主阶级的田庄府邸，所威胁的“社会”是保持奴隶主统治地位的社会，这就触怒了象周谷城这一类的历史家，遭到他们的毒骂。

周谷城对奴隶阶级斗争的诽谤和某些外国学者的反动谬论如出一辙。这些学者也说什么：在罗马帝国，掠夺居民的“土匪队伍”的活动的确甚为“猖獗”。相当部分的破产农民，逃亡奴隶变成了“土匪”，他们常常成为社会治安的严重“威胁”。他们在这里也把逃亡奴隶、隶农、破产农民向奴隶主阶级进行的正义斗争污蔑为“土匪”活动，把斗争的高涨称为“猖獗”，把严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称为社会治安的严重“威胁”。这和周谷城的论调有何不同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的人，总会找到共同的语言的。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谷城的历史感情是什么，他赞扬什么，诽谤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缘无无故的恨。”^②可见历史感情是有阶级性的，而不同的历史感情取决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周谷城之所以具有这种反动的历史感情，是和他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的。

周谷城的这部《世界通史》，严格说起来算不上是什么著作，只不过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反动观点“加以小学生样浅薄的……改头换面的剽窃。里面没有包含一个创造性的命题”^③只要翻一下他的‘大著’头两卷，不出两页就会碰到“塞克斯氏曰”“汉丁敦氏曰”“发克斯曰”“布勒斯特氏曰”等等，“曰”字后面往往又是大段大段的抄录，有时竟长达几页。书的内容也是杂乱无章，充满了神话传说，琐事奇闻，真正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很少，更谈不上深入分析。

当然，周谷城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出一个“有创造性的命题”，决不意味着书中的种种反动观点都挂在别人的帐上。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反动的阶级立场，使他对这些反动观点特别容易接受，加上学术研究方面极不严肃的态度，才使他信手地大量地抄来，然后加以改头换面，贩卖出去。我们说他的《世界通史》没有“包含一个有创造性的命题”，也决不意味着这部书就不值得批判。他把各种反动观点兼收并蓄杂凑于一锅，诸毒合流，其危害作用也就更大。更何况这部书只字未改地连续发行了三版，在读者中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尽管书是抄来的，但还是有揭露批判的必要。

1965年1月初稿

5月三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4页。